



国家治理丛书
GUOJIAZHILICONGSHU

国家学

GUOJIAXUE

(上卷)



王海明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国家治理丛书
GUOJIAZHILICONGSHU

国家学

GUOJIAXUE

(上卷)



王海明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家学 / 王海明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9
ISBN 978 - 7 - 5161 - 1687 - 6

I. ①国… II. ①王… III. ①国家理论 IV. ①D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50467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王 茵
特约编辑 徐申 赵丽 孙萍 韩国茹
责任校对 吕宏
责任印制 王炳图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86.5
插 页 6
字 数 1420 千字
定 价 198.00 元 (全三册)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国家治理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编 何包刚（澳大利亚迪肯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王海明（北京大学哲学系）
 王绍光（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学系）

学术委员会（按姓氏笔划排序）

王绍光（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王春光（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教授）
王海明（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许章润（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杨 龙（南开大学周恩来学院教授）
李良栋（中央党校政法部主任）
何包钢（澳大利亚迪肯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张千帆（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周文彰（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房 宁（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教授）
赵汀阳（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赵树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赵剑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
姚 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高全喜（北航法学院教授）

内容提要

国家学体系的轴心是国家制度价值推导公式：

前提 1：各种国家制度事实如何（国家制度好坏之价值实体）

前提 2：国家目的如何（国家制度好坏之价值标准）

结论 1：各种国家制度应该如何（国家制度好坏之价值）

结论 2：好国家制度如何实现之条件

国家学就是关于国家制度好坏的价值科学，因而全部对象都是从这个国家制度价值推导公式推演出来的。上卷《本性论》就是对“前提 1：国家制度事实如何”的研究。中卷《价值论》就是对“前提 2：国家制度价值标准”和“结论 1：各种国家制度应该如何”的研究。下卷《实现论》就是对“结论 2：好国家制度如何实现之条件”的研究。国家制度价值推导公式及其所由以构成的四个命题，可以推导出国家学全部对象，因而可以称之为“国家学公理”。这样一来，国家学不仅因其包容政治学和经济学以及伦理学和共产主义等科学的核心理论而是一门对于人类价值最大的科学，而且是一门可以公理化的跨学科科学。

国家治理丛书总序

当代中国国际治理与其他国家治理的根本区别在于，她是大国治理，涉及十三亿人口的安全、生存需要，及其社会秩序和公正。大国治理面临着一个有限的社会资源与大规模需求之间的矛盾，一个在工业化进程中充满着冲突日益尖锐的巨型社会，其头等要务是治理失业、贫困和腐败。在国际舞台上，中国面临着空前的挑战，世界上缺少对中国深度的、同情的了解，造成了很多不必要的误解和压力。中国的生存和竞争力取决于其政府治理能力的高低。

国家治理需要重新想象和重新建构，努力建构中国和世界的新型关系，协调政府、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改变“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治理体制，消除造成城乡、农工不平等的体制性障碍，实现人人平等的权力。国家治理要形成一种以普遍平等和全面公正为价值导向、以权利限制权力和责任规范权利为基础的民主型治理模式，加速户籍、就业、医疗、社会保障、农村土地等相关制度的改革，避免一种治理质量较低的“权贵勾结型国家”治理模式，实现民主施政。

本丛书立足全球，着眼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创建当代宪政文明为目标，重构以人本为基石、谋求大国治理之逻辑。它旨在：

1. 总结中外国家治理之经验、艺术和规律；
2. 发展和提升中国政治科学，特别是建立以治理为基础、富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科学；
3. 在实证基础上验证和发展大国治理理论；
4. 让世界了解中国学者的声音，了解大国治理的丰富经验。

何包钢

2011年5月5日

澳大利亚迪肯大学国际和政治学院

序

海明的新著《国家学》即将出版。他把书稿发给我，让我为它写一个序。我欣然从命。看到海明关于国家问题的研究已经大功告成，我特别高兴。在酝酿这个序的时候，不禁浮想联翩。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中国人民大学东门，那是1984年，他刚刚考上我们系的研究生，我正好被安排做他们的班主任。那时他34岁，但看起来好像只有二十几岁，如今他已经满头白发。听说他曾经遭遇“枪林弹雨”，但看起来似乎并没有受到什么伤害，身体依然十分健康，精力还是那样充沛，眼睛还是那样明亮，性格还是那样洒脱，思想还是那样敏锐。

1968年，海明应征入伍，非常兴奋。但是对于当时的“公字化”“忠字化”的政治氛围甚感困惑，决心研究这些问题。当时部队没有研究这些问题的条件，他就请求退役。未被批准，他就绝食，一绝就是24天。到第25天，海明停止了绝食，因为那一天，团政治处干事高高兴兴跑来通知他，团里同意了他的退役申请，但须等到半年之后，并且交给他一张盖有团部大红公章的中途退役通知书。半年后海明才知道，那是团部为了挽救自己生命耍的一个小把戏。海明现在讲及此事，还是眼含泪水，深深感激当年部队首长对战士的爱护。

海明属于那种极为看重健康珍爱生命的人，从小学开始就有意识地进行锻炼。这样一个人居然绝食24天，真是不可思议！也真够荒谬的！但从这里也可以理解海明此后40余年置一切于不顾地全身心投入读书和写作的执著。从那时开始，海明便沉溺于伦理学和哲学的研究与写作。1969年前后，他写出两篇论文：《反对“公字化”：论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关系》和《反对“忠字化”：论领袖与群众的关系》。到1983年，经过

14年，七易其稿，终于完成了一部八十余万字的《新哲学》书稿。1984年，海明开始在这部书稿有关“公字化”等道德哲学部分的基础上，几乎谢绝一切社会交往，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撰写《新伦理学》，一直到2006年11月26日，才最终完成，历时22年。接着，海明开始运用其中关于国家制度价值标准——公正、平等、人道、自由和增减每个人利益总量——理论，在《新哲学》书稿有关“忠字化”等政治哲学部分的基础上，撰写他40年来一直关注、思考和研究的国家理论，于2012年完成这部《国家学》。哲学是时代精神的体现。海明的《新伦理学》和《国家学》两部巨著，原本是极具中国那个时代特色的对“公字化”和“忠字化”运动的反思。

从《新伦理学》来看，海明的观点应该说是属于“马克思主义左派”一边的。他在该书中不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论、剩余价值理论，论述了共产主义的应然性和必然性，论证了共产主义是社会治理的最高理想，而且还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在《国家学》中，海明虽然也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不再适合生产力发展以及阶级结构和阶级矛盾等观点提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但他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五种社会形态理论，驳斥了今日众多学者对这一理论的否定和批评。他坚持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称之为人类思想史上的最伟大的发现。他坚持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以15万字的篇幅，详尽论证了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他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同样以15万字的篇幅，探讨共产主义社会特征以及实现共产主义的条件和途径。他虽然对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也有自己的不同意见，但他坚持认为民主社会主义否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是根本错误的。

可见，尽管海明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许多观点都提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但这并不影响他是一个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坚决的否定者和批判者，是一个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坚定的信仰者和辩护士。我想，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遭受重创处于低潮的今天，特别需要像海明的《国家学》这样充满原创性和批判精神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著作。听说，海明在北京大学讲授《国家学》课程时，一开始学生们大都否定共产主义；但到期末，这些学生却大都变成了共产主义的信徒。海明的《国家学》以帮

助人们重新皈依共产主义为自己的使命，可以相信，它的这个使命也一定能够很好地完成。

杨焕章

2012年7月15日

中国人民大学静园

自序

我1950年2月初二生于吉林镇赉铁路公寓，4岁搬到农田环绕的小乡镇坦途火车站，一家八口住在铁道西附带半亩菜园子的一间半土房，一直住到18岁。我至今依然记得，还没到入学年龄，我就经常跑到绿树合抱的坦途三完小，趴在教室窗户外听课。1957年，距上学年龄还差一年，我就自作主张到学校报名上学。结果，有一天老师真到我家来了，我远远看到，就飞也似地跑回家洗脸，好给老师一个好印象。1963年我小学毕业，获优秀毕业证书，升入邻校镇赉三中。不论小学还是初中，我的学习成绩总是全班第一。但学得最好的并不是语文和政治，而是数学。当时校长吴国兴教数学，他对我很好奇，因为我小小年纪，竟然重编数学教科书，而且一贯不做习题，只靠领会原理，但每次考试几乎总是第一。一天吴校长来我们班讨论，他微闭双眼，静静听我们发言。会后，他找我谈话，让我写一下数学学习体会，给全校学生做个报告。我那时只有16岁，报告的题目居然是“我走过的路”。幸好还没有交给校长，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就开始了；否则，他看了一定会笑掉大牙。

这场运动不仅要了这位我心中最好中学校长的命，而且也改变了我的命运。没有它，我或许会成为数学家。然而，当其时也，举国上下，差不多每个人胸前都挂着一个形状犹如心脏的红牌子，牌子上写个“公”或“忠”字。不论挂着“忠”还是“公”的牌子，每个人都必须积极参加“公字化”和“忠字化”运动。

“公字化”运动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全国各单位都必须大轰大嗡开展所谓大立“公”字、大破“私”字、狠斗“我”字、把自己从“我”字中解放出来的“公字化讲用会”。讲用会最流行的口号就是大庆人的豪

言壮语：“离我远一寸，干劲增一份；离我远一丈，干劲无限涨；我字若全忘，刀山火海也敢上。”就连书呆子数学家陈景润，也万分激动地真诚呼吁：“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有命不革命，要命有何用？”

“忠字化”主要是“三忠于”和“四无限”运动。每个人必须天天宣誓：永远忠于毛主席和无限热爱毛主席。登峰造极之时，全国人民都要跳忠字舞。当时我还在部队当侦察兵。我们的副团长是战斗英雄，脖子都被打歪了，胸前弹伤累累，也一边满脸庄严肃穆、笨手笨脚地跳着忠字舞，一边瓮声瓮气、信誓旦旦地唱着“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不但人人必须跳忠字舞，而且人人饭前必须祝福：祝愿毛主席万寿无疆。每个人每天还必须毕恭毕敬站在毛主席像前，向毛主席“早请示”和“晚汇报”，诉说自己的“活思想”。

我自然也必须积极参加这些活动，但内心异常苦闷和困惑，遂决心研究这些问题。但部队没有研究条件，要进行研究和写作必须离开部队。可是，当时部队很器重我，全师士兵只挑选两个人——我是其中之一——送往锦州机要学校学习两年，前途无量。究竟是在部队争取当将军，还是回家种地著书立说？我反复考虑了一个月，最后选择了后者。当我以红绿色弱为由申请中途退役而未被批准的时候，我做出了一个让我现在还后悔和痛心的可怕的错误决定：绝食。

我整天躺在床上，不吃饭，只喝水，除了撒尿，从不下床。这对于食欲旺盛天性好动的我来说，是极度痛苦的。但我当时想，只要坚持三天，就可以回家了。然而，到第三天，我眼巴巴盼望着批准我回家的通知，一直到晚上也没有消息。三天没吃一点东西，难受极了，我觉得坚持不下去了。但我想第四天一定会来通知的，一定坚持到第四天。第四天果然来人了，但我抖抖精神，定睛一看，来的怎么全是白大褂：他们都是军医呀！

领头的长相凶狠，牙齿外露，手里拿着带有长长胶皮管的漏斗，一边比划一边严肃地问我：“到底吃不吃？不吃就把这个管子插进你的鼻孔和食道，往里灌鸡蛋汤，那可难受极了！”他一听我的回答是不吃，就对另外几个人说：灌！他们一下子拥上前来，按住我的四肢和脑袋，一个管子就插进我的鼻孔和食道，我一阵痉挛作呕，接着就觉得一股热乎乎的东西流进来，我心里想，那就是鸡蛋汤吧。完事了，他们又劝慰一番，吓唬

一阵，说铁打的部队绝不会对你一个人妥协，否则岂不都绝食了？

然而，我想无论如何也要退役著书，除了绝食还能有什么办法呢？于是我决定坚持绝食。每天我都在想，再坚持一两天就能胜利。靠着“再坚持一天就能胜利”的信念，竟然一直绝食24天——如果一开始就知道要绝食24天我决不会选择绝食——每5天左右他们就來三四个人将我结结实实按住灌一次鸡蛋汤。到第25天，团政治处干事田守宽跑来，笑眯眯地向我摇动着手里的一张纸喊道：同意啦！我一下子坐起来，抢来一看，真的是批准王海明半年后中途退役通知书，还盖着3150部队的大红公章呢。我高兴极了，立刻吃饭了。期限快到了，我找田守宽询问怎样办手续。这个好人一听，哈哈大笑，说哪里有什么中途退役的事！那是他为了挽救我偷偷地盖上的公章。我一听呆若木鸡，不可能也不愿意再绝食，只好再等一年半兵役期满复原了。

后来我常想，如果当初田守宽不弄虚作假，我会一直绝食下去吗？很有可能。忍受此等极端痛苦、付出此等极端代价，究竟是为哪般？只为一件事：撰写解析“公字化”和“忠字化”的著作。荒谬之极！偏执之极！固执之极！然而，此乃我的“长江”之源头也！从1968年4月绝食后第一天吃饭开始，一直到今天，45年来，我变成了地地道道的吝啬鬼：吝啬的是时间而不是金钱。这16425个日日夜夜，我几乎谢绝一切社会交际和亲朋往来而只做四件事：著书立说、锻炼身体、睡觉和应付工作。吾师杨焕章和魏英敏先生早有警告：如此独往独来岂不注定前途坎坷多难！诚哉斯言！但我惜时如金，无论如何也要将一切时间都尽可能用到写作上来。著书立说就是我人生的目的和意义，实在比性命还重要，坎坷和磨难又算得了什么？

就这样，到1970年2月复原前夕，我写出两篇论文：《反对“公字化”：论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关系》和《反对“忠字化”：论领袖与群众的关系》。到1983年，经过14年的孤注一掷，七易其稿，终于完成了一部80余万字的《新哲学》书稿。1984年，我开始在这部书稿有关“公字化”等道德哲学部分的基础上，撰写《新伦理学》；虽然置一切于不顾，竟然也一直写到2006年11月26日，这部150余万字数书稿才最终完成，历时22年。

接着，我运用《新伦理学》关于国家制度道德原则——亦即国家制

度根本价值标准“公正与平等”和国家制度最高价值标准“人道与自由”以及国家制度终极价值标准“增减每个人利益总量”——理论，在《新哲学》书稿有关“忠字化”等政治哲学部分的基础上，撰写我40年来一直关注、思考和研究的国家理论。2012年6月29日，在海南琼海官塘“忘机轩”书房，完成了这部百余万字数的《国家学》，历时5个寒暑有余。是日也，雨过天晴，恰有彩虹高悬，瞬间消散。当此风云变幻之际，不禁思绪万千。遥想为研究“公字化”和“忠字化”而绝食之时，没有料到竟然要绝食24天，更未料到这一研究的完成，要我放弃功名利禄地位尊严而孤独寂寞潜心著述40余载：14载《新哲学》、22载《新伦理学》和5载《国家学》。

然而，真正算起来，《国家学》亦堪称十年磨一剑之作也！因为《国家学》与《新伦理学》研究对象虽然根本不同，却是具有内在联系的姊妹篇。这不但是因为，自古希腊和文艺复兴以来，伦理学的核心和基础就是国家制度价值标准——公正与平等以及人道和自由——因而政治学和经济学以及共产主义理论不过是伦理学之引申和运用；更是因为，一方面，《国家学》的核心就是好国家的问题，因而完全依赖于《新伦理学》关于国家制度价值标准的研究；另一方面，《国家学》公理化体系的构建，完全依赖于《新伦理学》对于《元伦理学：伦理学公理体系》的研究；如此等等。因此，这两部篇幅差不多的书稿的写作时间应该一起计算：一共写了27年。这样平均下来，《国家学》的撰写岂不十载有余？

不过，写作《国家学》之初，我并没有想写国家问题。因为我撰写的核心问题始终是“忠字化”和“公字化”所关涉的专制主义与共产主义。然而，2007年正式动笔写作时，我依然深信马克思国家理论：国家就是阶级压迫的工具，因而共产主义没有国家。这意味着：对共产主义的研究在《国家学》之外。可是，我很快就认识到，人类在任何情况下都因其必然结成社会而必然存在权力和最高权力，必然存在拥有最高权力的社会，因而必然存在国家：国家就是拥有最高权力的社会。因此，国家从来就有并将永远存在而不可能消亡，国家只能随着社会发展和阶级生灭而不断转型：已由原始社会无阶级的部落国家，转型为阶级社会的阶级国家；已由公元前一千年多达一百万个国家，转型为今日一百多个国家；势必将由这一百多个阶级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转型为只拥有一个主权和

一个政府的世界大同的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的全球国家。

这样一来，共产主义就属于国家学的研究对象了。诚然，在科学领域，似乎并没有国家学，甚至还没有国家学这个名词。但是，国家学作为一门科学，早在古希腊时代就已经创立。它的奠基之作，就是柏拉图的《理想国》：国家学就是关于理想的、优良的、正义的、应该的、好的国家制度及其实现条件的科学。自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降，两千五百年来，国家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一直是国家制度好坏价值问题，一直是好的优良的理想的国家制度及其实现条件问题。这个问题，自柏拉图《理想国》以来，又一直具体表现为两方面。一方面是，以执掌最高权力的公民人数（或政体）为划分根据的诸种国家制度——民主共和与寡头共和以及有限君主制与专制君主制——究竟何者堪称优良？另一方面，以生产资料所有制（或经济形态）为划分根据的诸种国家制度——原始公有制、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究竟何者堪称优良？

我的研究的结论是：

首先，就各种国家制度的自身内在价值来说。只有普选制民主与共产主义制度是好国家制度；而其他任何国家制度都是坏国家制度。因为国家制度好坏，根本说来，取决于有无权力垄断：权力垄断是剥削和压迫的根源。哪里有权力垄断，哪里分为无权群体与有权群体，哪里就必定存在压迫与剥削：垄断权力的群体必定压迫和剥削无权群体。准此观之，一方面，唯有普选制民主是所有国民完全平等地共同执掌国家最高权力，从而不但消除了政治权力垄断及其必然导致的剥削和压迫，而且完全符合国家制度价值标准——国家制度根本价值标准“公正与平等”和国家制度最高价值标准“人道与自由”以及国家制度终极价值标准“增减每个人利益总量”——因而是唯一的好国家制度；而限选制民主和非民主制（寡头共和与有限君主制以及君主专制）都不但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政治权力垄断，而且程度不同地违背国家制度价值标准，因而都程度不同地是坏国家制度。另一方面，唯有共产主义因实行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每个人都完全平等地拥有生产资料，亦即完全平等地拥有经济权力，从而不但消除了经济权力垄断及其必然导致的剥削和压迫，而且完全符合国家制度价值标准，因而是唯一的好国家制度；而其他任何国家制度，特别是奴隶制与

封建制以及资本主义都实行生产资料私有制，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经济权力垄断，都程度不同地违背国家制度价值标准，因而都程度不同地是坏国家制度。

其次，就各种国家制度的外在适用价值来说。以经济形态为划分根据的六种国家制度——原始共产主义、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都被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必然决定，都具有不依人的意志而转移的历史必然性，都只应该实行于一定的国家一定的时代，而不应该实行于一切国家一切时代，因而都不具有普世性和普世价值。试想，奴隶制岂不仅仅对于它所取代的原始社会来说才是应该的、好的和具有正价值的？岂不仅仅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逐渐提高以致出现了剩余产品的时代才是应该的、好的和具有正价值的？而对于其他任何时代任何社会岂不都是最坏的制度？资本主义是不好的不应该的制度，岂不仅仅对于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社会才能成立？对于生产力不够发达的社会，资本主义岂不是最好的制度？共产主义是最美好的制度，岂不也仅仅对于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社会才能成立？而对于生产力不够发达的国家来说，实行共产主义岂不意味着莫大的灾难？

相反地，任何政体，不论民主制还是非民主制，都曾出现于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的任何历史阶段，都曾出现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这意味着，任何政体，不论是民主制还是非民主制，都不是被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所必然决定的，都是偶然任意的而不具有历史必然性，都能够实行于任何国家任何时代任何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因而都具有普世性和普世价值。这样一来，民主制不但是唯一好的国家制度，而且对于任何时代任何历史条件下的任何社会都是唯一好的国家制度，任何时代任何历史条件下的任何社会都应该和适宜于实行民主制：民主制具有绝对的普世正价值。反之，专制等非民主制不但都是坏的国家制度，而且对于任何时代任何历史条件下的任何社会都绝对是坏的国家制度，任何时代任何历史条件下的任何社会都不应该和不适宜实行专制等非民主制：专制等非民主制具有绝对的普世负价值。

最后，就理想国家制度的实现条件来说。实现民主与实现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的性质——是否必要条件——根本不同。生产力高度发达是实现社会主义的直接的客观条件，而资本主义与民主（只有资本

主义与民主才能够创造实现社会主义所必须的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则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的客观条件。民主实现的客观条件主要是财富加速度增长(经济条件)、发达的公民社会(社会条件)和盛行公民文化(文化条件)。民主实现的偶然任意性和普世性,决定了民主实现的客观条件,不论是经济条件还是社会条件抑或文化条件,与民主的实现都不具有必然联系,都不是民主的决定性因素,因而都既不是民主的充分条件,也不是民主的必要条件,而只是民主的有利条件与不利条件。民主能否实现的唯一决定因素,乃是民主的主观条件,亦即人们实行民主的欲望和行动。因此,不论民主的客观条件如何不利于民主的实现,只要欲求民主的人们力量占据上风,民主就能实现;相反地,只要反对民主的人们力量占据上风,不论客观条件如何有利于民主,民主都不能够实现。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原始社会的经济条件极其有利于实现民主,却仍有非民主制产生;尽管封建社会的经济条件极其有利于实现专制,却仍出现过封建共和国;尽管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条件极其有利于实现民主,却仍有拿破仑和希特勒专制;尽管印度不但贫穷,而且其经济类型原本属于亚细亚生产方式,极其不利于实现民主,却仍然实现了民主。

相反地,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非普世性,决定了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生产力高度发达与民主以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实现具有必然联系,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决定性因素,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因为,一方面,生产力高度发展——从而使每个人的物质需要得到相对满足——乃是国民思想品德和政治觉悟普遍提高的根本条件。如果没有实现民主,如果资本主义没有充分发展,说到底,如果生产力不够发达从而产品还不能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物质需要,那么,国民思想品德和政治觉悟决不可能普遍提高。这样一来,便唯有私有制才有效率;而公有制则注定无效率:生产力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必定效率低下。另一方面,没有实现民主、资本主义没有充分发展因而生产力不发达的国家,要实现社会主义几乎不可能通过民主的议会的道路,而势必通过非民主的、为民做主的武力征服、暴力革命道路;暴力革命是生产力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普遍规律。暴力地、不民主地、为民做主地夺取的政权,势必成为一种暴力的、不民主的、为民做主的政权,势必继续为民做主执掌政权,从而导致专制等非民主制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问题的关键在于,只要实行非

民主制，就意味着政治权力垄断，就意味着存在垄断政治权力的官吏阶级和没有政治权力的庶民阶级。实行非民主制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则意味着全权垄断，意味着官吏群体不但垄断了政治权力，而且通过垄断国有资源和公有制生产资料而垄断全国主要经济权力，进而垄断文化权力（如言论出版权力）和社会权力（如结社集会权力），成为全权垄断阶级；庶民群体不但没有政治权力，而且没有经济权力、文化权力和社会权力，是丧失全权阶级。这样一来，在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中，庶民阶级不但遭受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压迫与剥削——全权垄断的压迫和剥削——而且不服从官吏阶级就意味着没有工作，就意味着饿死，以致几乎丧失全部自由而与奴隶实无二致。因此，不具备实现社会主义客观条件——生产力高度发达与资本主义充分发展以及民主——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必定是一种政府官员拥有控制国民全权的奴役制社会主义，无疑比资本主义坏得多。这就是为什么，宛如梦与神话，十月革命一下子使人类怀抱两千多年的社会主义理想变成了现实，然而半个多世纪社会主义建设的结果竟然是回归资本主义。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恩格斯一再说：生产力高度发达与资本主义充分发展以及民主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如果在这些条件还不具备的时候就实行社会主义，即使胜利了，也必定是暂时的，是一种唐·吉珂德式的荒唐行为。

本书的主要价值，与其说是对这些结论的证明，毋宁是对证明过程中所遭遇的大小数以百计的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而至今未决难题之解析。难题如此之多，显然是因为国家学包容政治学 and 经济学以及伦理学和共产主义四门科学核心理论，因而也就几乎囊括了四门科学的全部主要难题。当我遭遇每个难题而阅读了能够找到的有关全部书刊文献之后，差不多每次都觉得：这个难题我可能真的解决不了啦！但是，我从来没有越过一个难题，而一定是绞尽脑汁不间断地苦苦思索，几乎每天夜半醒来都要思考一两个小时再入睡，甚至梦中还在努力推理。恰像孕育胎儿一样，慢慢酝酿一定时间必有结果，总能隐约发现难题之谜底。这时我便坐在电脑前，一句话一句话地写出来，一句话一句话地推导下去，难题之庐山真面目也就越来越清楚，最终一定会完全显现出来，也就完成了该难题之解析。我想，真正研究这些难题的人都会看到，本书——当然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首次说清楚了所有这些难题；就像我的《新伦理学》首次